

王明蓀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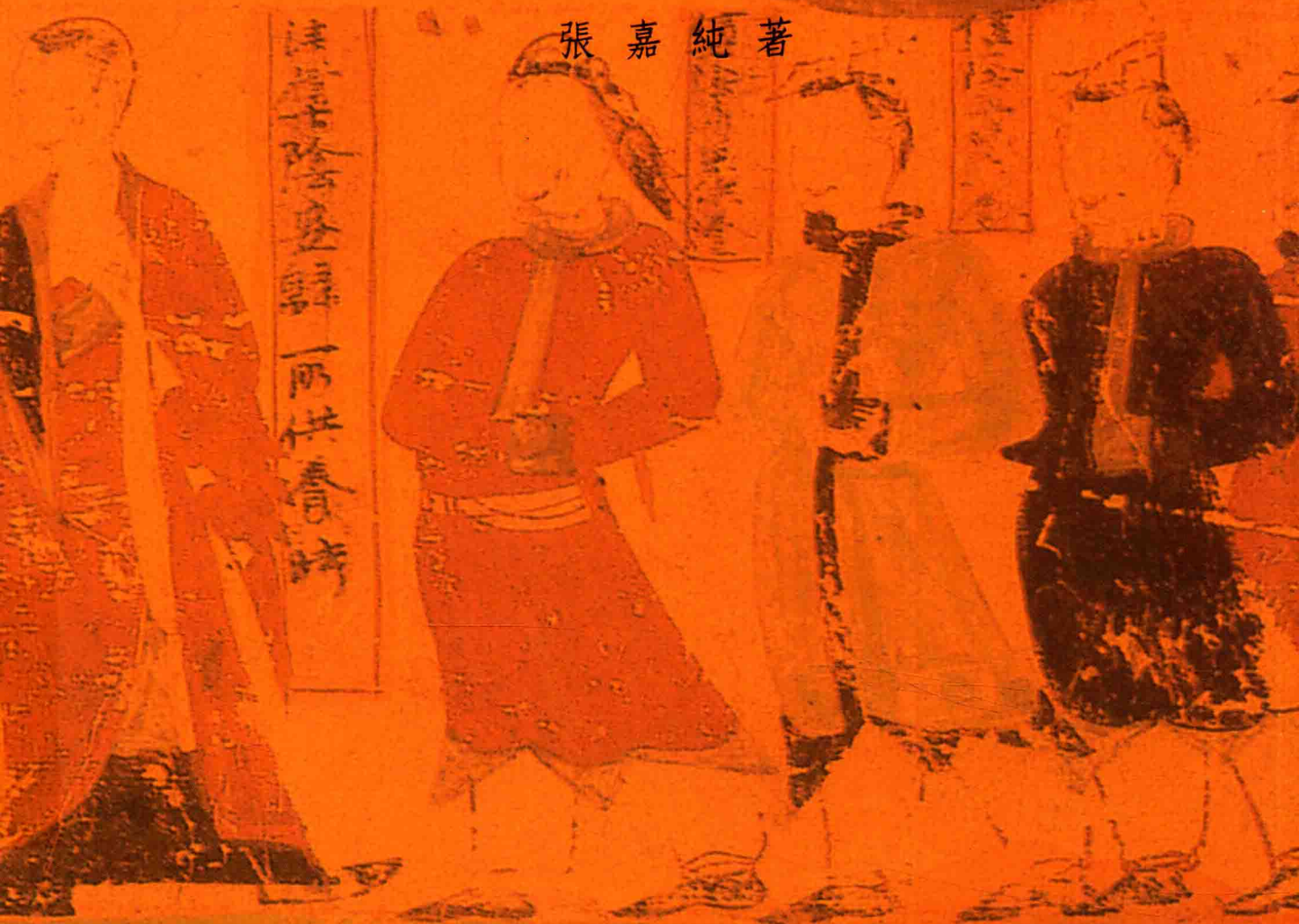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四編 第九冊

蜀漢知人群體研究

張嘉純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四編

王明蓀主編

第9冊

蜀漢知人群體研究

張嘉純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蜀漢知人群體研究／張嘉純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4+274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9 冊)

ISBN 978-986-404-317-0 (精裝)

1. 人物志 2. 個案研究 3. 蜀漢

618

104014373

ISBN-978-986-404-317-0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九冊

ISBN：978-986-404-317-0

蜀漢知人群體研究

作 者 張嘉純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245729 字

定 價 十四編 28 冊 (精裝) 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蜀漢知人群體研究

張嘉純 著

作者簡介

張嘉純，1974年出生於台中大雅。政大中文系學士、碩士，台大中文系博士，目前任教於台北市立復興高中。在文學品味上，喜歡閱讀經典，蓋經典以其對天地自然萬物的深刻體察而成經典，故易打動人心深處。近十餘年來，受顏宗養老師之啟發及引導，對於生命探索、歷史研究、傳記、教育的熱情逐漸提升。期許自己能在生命探索中，找回學習的快樂，點燃智慧的明光，而後也能如顏老師一般，不斷錘鍊自己，同時化育莘莘學子。

提 要

本文題為「蜀漢知人群體研究」，試圖從月旦評中受冷落的許靖切入，往下探索三國最弱勢的蜀漢，與學界以郭泰、許劭為起點，以魏·劉邵《人物志》涵蓋三國之人物品鑒主流研究，進行對話。同時，從學界較少關注的「知人群體」角度切入，以蜀漢三位知人者：許靖、龐統、諸葛亮為論述架構，探問其為何品鑒？有何意圖及眼光？超越及限制？以建構出蜀漢知人群體之別相及共相。

論文架構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論許靖，釐清時人好許劭之因素，並區辨許靖、許劭月旦動機之差異。第三章論龐統，探究龐統仕吳一年，以知人形象聞名江東之歷史真相。第四章論諸葛亮，以諸葛亮治蜀時期，對十位人才之鑒用廢捨，推敲出諸葛亮的用人之道。鋪陳三人別相後，總結出蜀漢知人群體意識，皆框限在劉氏正統觀下，且擇定劉備後，即表現濃厚的忠君情懷。從中反映，儒家意識猶深植人心，因而凌駕三人對人物之鑒別，此其眼光侷限處，但亦其人格成功處。而劉備亦利用正統觀，遂行其爭天下之意圖。故三位知人者在蜀漢所扮演的角色，皆是劉備爭天下的一顆棋子，許靖是招攬賢才者，龐統是謀略者，諸葛亮是決策者。劉備用東漢尚名餘風，禮敬許靖以廣招人才。用龐統為活棋，靜待孫吳之需，而以知人身分為掩飾，切入甚深謀略。用諸葛亮治理蜀政，司人才廢用之決策。其間之推移可知，品評從東漢昏聩政局下的權位鬥爭；到群雄割據亂世，爾虞我詐的天下爭奪戰；再到三國鼎立，鑒用決策攸關政權穩固、國祚長短及天下一統。由此可見知人群體雖在共同的歷史條件下產生，但知人內涵實隨著環境條件而不斷變異。

而綜觀東漢中期以來之知人群體，唯郭泰一人，真正以「道」為核心，以品評淑世，雖預見漢室之亡，仍步履孔孟，周遊華夏，而化育六十人成英彥。其既以冷眼洞識時務，又以熱情為亂世播下善種，非但「知人者智」，又頗具聖人風流。

誌 謝

這篇論文，得之於人者多，出之於己者少。也是在倉促之中成稿，還有許多未盡圓融之處，但也算是生命一個難熬的階段跨過了。

首先得感謝的，是我的師長群。論文得自兩位老師的悉心指導。鄭師毓瑜是我台大的指導教授，她給我極大的自由跟包容，總是耐心等待，但一收到論文稿，便飛快批閱。即使數萬字的章節，她都能在極短時間內，抓出我的思辨重點及盲點。她慣於緊盯結構，細部內容任我發揮。寫得精彩處，從不吝於大方讚美，經常讓我興奮許久。一旦論述偏了軌，也明白提示方向，要我多思考。老師的直率、精準、開放，是我學習的好榜樣。而她對學術的熱情，更令我讚嘆不已。這本論文能出版，亦出自鄭老師的推薦，這份提攜及肯定，使我深受感動。

顏師宗養是我政大的佛學老師，也是一路引領我探索生命的恩師。這本論文雖寫三國歷史，但在老師解析下，人物似全活了過來。老師帶領我看他們一生的成功與失敗，令我多次動容，也心生警惕。老師定位人物的方法謹嚴，多條線索交叉比對，始做出判斷。本文三位知人品鑑者，皆得自老師的引導而定位。他原是我的生命導師，見我火燒眉毛，焦慮不安，熱情為我解套。然而也因指導論文的因緣，使我更有機會見識、學習老師的「知人」功夫。在老師而言，人心無分古今，研究亦不割裂於生命之外。我在論文寫作中深受啟發。

另外，還要感謝四位論文審查老師，態度極為謙和，給予我許多細微的指導。首先是張師蓓蓓，她鉅細靡遺，從目錄到各章論述，一一為我指出錯誤、不夠圓融之處，連修正內容都費心思為我擬好。老師對我論文的精熟程

度，尤其令我起敬，可知她在私下下了多少功夫。其次是王師文進，他本身就是位三國頑童，對這本論文的諸多論點興味盎然，也熱情交流他對三國人物的解讀。他一一指出文中論述獨到處，並稱讚論文寫得神采奕奕，給了我極大的鼓勵。老師又指點各章論述的切入方向，使論文提升不少學術價值，而稍減我語言通俗之弊。其三是蔡師英俊，他引入地域文化、言論與權力空間等理論，供我擴展不少研究觸角，惜我學力有限，無法在短時間內修正。其四是廖師棟樑，他在心態史、材料運用等方面，提供許多建議，並補充不少重要書籍供我參考，使本文的研究材料更加完備。諸位老師們為一個不成熟的學子如此用心，著實令人感動。我也很榮幸，能借論文寫作，與老師們結下一些難得的緣份。

其次，得感謝諸多學友的鼎力相助。信宏、鎧銘、晏州是我諮詢的好學伴，舉凡閱讀草稿、挑錯字、異文提供、不同角度的意見觸發，以及最重要的史料詮釋，都給予我相當多的指正及幫忙。智容學姐、展政則費心將我晦澀的中文提要，翻譯成流利的英文。筠珺是幫忙打字的小學妹，為我速記討論內容，整理功夫一流。子傑、敘辰為我繪製三張可親的地圖，使抽象的文字得以按圖索驥，形象更加鮮明。還有朱英龍教授耐心替我鋪緒論，學長阿雄熱情幫我張羅三國書籍，同學玉如與我一起釐清思路等等……，沒有大家的幫忙，論文完成恐怕還更遙遠。

而我先生長期忍受我的易怒、驕縱，還得細心呵護我的飲食心情，不時再貢獻點論文意見，簡直是負責滿足我各種需求的強大助理。我寫論文，他跟著受苦，幸而這一路有他扶持。親友加油團也是重要後盾，姐姐的親情支持，蓮友的加油打氣，同事的支援、朋友的諒解……，終於可以過點有人情味的生活了，謝謝你們包容。雖然封閉了很久，但其實學到不少，探索也還沒結束。最後，得感謝顏老師及石媽媽帶領修行，讓我還能持平走過。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及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章節架構	11
第三節 文獻回顧	12
壹、人物品鑒研究	12
貳、個別人物研究	19
第二章 許 靖	31
第一節 帝制結構下之汝南月旦評	34
壹、黨錮與月旦評	34
一、黨議之興	36
二、黨錮、清議深層因素探究	42
三、黨錮前後，知人典範之轉移	48
貳、汝南清鑒傳統	52
第二節 許靖、許劭月旦動機探究	59
壹、許劭「清論」動機探究	60
貳、許靖「清談」動機探究	72
一、德行篤厚	72
二、劉氏正統觀	75
(一) 遠董卓、避孫策、拒曹操	75
(二) 應劉璋、投劉備	81

第三節 許靖出仕後之品評、動向及時代趨勢……	85
壹、汝南凋零，汝穎分流……	85
貳、從郭泰至二許……	94
小結……	98
第三章 龐統……	103
第一節 劉表政權下龐統的應世模式……	106
壹、劉表割據政權之興衰……	107
一、劉表之長……	109
二、劉表之短……	112
(一) 結合地方權貴……	112
(二)「雍容荊楚，坐觀時變」……	116
貳、襄陽「謀士」集團之特質……	122
一、從龐德公、司馬徽推敲集團特質……	123
(一) 迴避劉表，隱以待時……	123
(二) 好論時務，熱衷仕途……	126
二、從諸葛亮再探集團之「識時務」……	133
(一) 遨遊何必故鄉……	133
(二)〈隆中對〉對時務的看法……	136
第二節 龐統仕吳之角色扮演……	138
壹、龐統出仕周瑜郡功曹……	140
貳、孫吳對龐統之用與不用……	142
一、聯盟關係的爾虞我詐……	142
二、荊州的特殊地位……	151
參、龐統郡功曹時期之交遊……	154
一、正統江東士陸績……	154
二、昌門會之其他參與者……	158
第三節 由龐統仕蜀再探其角色扮演……	161
壹、襄陽集團動向……	161
貳、龐統仕蜀後動向……	163
一、耒陽令不治……	163
二、攻益州謀略……	165
(一) 攻蜀之時機與方式……	165
(二) 攻蜀行動之掩飾……	173

參、龐統後事風光	177
小結	181
第四章 諸葛亮	185
第一節 諸葛亮鑒用核心探究	187
壹、內政由亮	188
貳、盡時人之器用	193
參、由法正推敲諸葛亮鑒用核心	199
一、法外開恩	199
二、夷陵之嘆	206
(一) 關羽爭建奇功	206
(二) 劉備破壞聯盟	209
肆、彭恙之死	216
第二節 劉備死後，將相廢用探究	219
壹、廢廖立	221
貳、廢李嚴	225
參、遺命蔣琬、費禕	232
第三節 北伐用人探究	235
壹、用馬謖	235
貳、結孟達，用姜維	242
參、由北伐論諸葛亮之人格	247
小結	254
第五章 結 論	257
參考書目	263
圖表次	
圖(一)：許靖、許劭流亡圖	99
圖(二)：漢末荊州簡圖	100
圖(三)：龐統、諸葛亮活動簡圖	101
表(一)：曹魏知人群體	22
表(二)：孫吳知人群體	25
表(三)：蜀漢知人群體	2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及研究目的

知人論述在中國文化有很深的淵源，儒道等流派都曾對此提出自己的觀點。以儒家系統而言，知人問題在先秦即受到重視，但論述重心向來不是放在智識層次上來談。《尚書·皋陶謨》可為代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天命有德……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註1〕

皋陶對禹提出治理國家的三項要求：修身、知人、安民。其中，知人之哲智，乃與修身、安民的德性範疇並置來談，而透過大禹「惟帝其難」之嘆，再與「官人」問題相連結，使得修身、知人，過渡到官人、安民，形成一由內向外，由近及遠，智攝於德下，但德必須兼智，始能逐步擴充展現的濟世論述。故雖有知人之智，若無安頓百姓之惠，仍無法免除對叛亂的憂懼。但若無知

〔註1〕《尚書·皋陶謨》，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59～60。

人之智，亦無法透過制度推擴力量，使個人完成濟世理想，故皋陶針對大禹知人安民為難之嘆，提出檢驗人行為的九種德行，以供禹觀察任用，而保障任官者皆賢能。接著，皋陶提示大禹，政權的合法性乃架構在更高的權威，即「天命」上，而天意乃根據民意，由此，國君之地位鞏固，必須仰賴百姓的視聽反應。因此，以帝為主體的知人安民為難之嘆，便被巧妙引至以百姓為主體，知人安民乃帝之存在基礎的思維中。

《尚書》所載，可代表孔子以前的儒家意識，其時「知人」問題乃被放在「安民」的濟世論述下，並形成「知人——官人——安民」此一以民為本，又以民為終極目標的邏輯思維中，知人乃官人、安民之先決條件，而官人居間為中介，呈顯儒家乃以出仕做為濟世的主要途徑，而政治場域即是其安頓百姓的理想實踐處。

將此一儒家意識發揮最極致者，即是孔子。孔子一方面周遊列國，尋找明君實踐其仁道思想；另一方面直指人心，積極而隨機地啟發教化百姓。然而，在邦無道、仁道不行的現實處境中，孔子最終從政治抽身，而致力於教育一途。於孔子，雖有些許失落，但如此抉擇並不違背其初衷，蓋皆以安民為懷矣。故孔子何以被尊為儒家至聖典範？正在於他以在野身分，樹立因材施教、有教無類之教育風範，將個人篤守之仁道，積極播種於人心。所謂因材施教，必須基於對人物的細膩觀察及了解，從這個角度而言，孔子不僅「是一偉大之教育家，同時亦是一偉大之觀察家。」〔註2〕所謂有教無類，則展現孔子對待人類的平等心，他亦肯定所有人物皆有下列學上達的潛質，從這個角度而言，孔子亦是一熱愛生命的博愛家。故而，在多次面臨濟世理想與政治衝突後，孔子轉向教育，著眼於將仁道思想深植人心，並以其對人物之敏銳洞察，傳下四科十哲，教化之功遠及現代，並成為中國主流文化。由此，孔子雖無帝王官人之政治權力，卻以其知人之明、造道之深，而成就安民濟世之理想，故能得素王之稱，〔註3〕而為儒家至聖也。

進入漢朝，在董仲舒提出賢良三策，武帝批可後，即確立尊經重儒的政教大綱，並透過徵辟察舉制度往基層推行。此後，經明行修成取士標準，鄉

〔註2〕王仁祥《人倫鑒識起源的學術史考察（魏晉以前）》（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年11月），頁118。

〔註3〕如《淮南子·主術訓》：「（孔子）專行教道，以成素王。」頁313；又如董仲舒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參《漢書·董仲舒傳》，頁2509。

閻清議為選舉主要依據，武帝甚至宣令「不舉者」、「舉不得人者」皆將議罪，以保證朝廷行政人才的需求。隨著朝廷對選舉的重視，如何觀察人物、等第人物，也就成為時代課題；〔註4〕而儒家意識亦透過選舉，貫徹《春秋》大一統思想於漢民。且不論董仲舒所上對策，是否基於對儒學的崇高信仰，但在武帝，則是將儒學做為一種統治的意識型態，〔註5〕並成功鞏固了君權，確立君臣上下之階級。徵辟察舉制度，即將地方州郡牢牢鑲嵌於政治結構中，又將《尚書》中對於帝王的「知人」要求，轉成對各級統治階層的職分監督，再加上歲舉的頻繁性，知人察人已成兩漢社會普遍而重要的活動。為了達到官人之效，保障執政者自身權位，有知人能力的品評者，逐漸浮上舞台。

至此可知，經過不同的人心運作，知人問題已從安民為本，轉成君王為上。而以名為教的儒家意識，也因長期結合選舉、勾牽利祿，使「名」的意涵變得更加複雜，「既是名譽也是地位、權力更是財富。」〔註6〕於是本重道德旨趣的「名」，轉向政治旨趣的「名」，〔註7〕其本身再唯物化為士人競逐的對象。在此人心貪婪中，名教弊端層出不窮。到了東漢中期，終在戚、宦貿易選舉，操控鄉閭清議，政局搖搖欲墜中，誘發了有權、有能的品評者，建構以知識清流為標榜之輿論系統，以對抗濁流。可以說，人物品鑒實是士人階層因應當時政治情勢，試圖發揮群體力量，所經營出的發聲管道，此余英時所謂「群體自覺」

〔註4〕參見賴麗蓉《魏晉『人物品鑑』研究——創造性審美活動的完成》（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黃錦鎰先生指導，1995年），頁55。

〔註5〕如王邦雄云：「在君主專制的態度上，董仲舒不僅變得模糊，有些說法甚至可以被理解為替君主專制張目。」見王邦雄等編著《中國哲學史》，（台北：空大，1995年），頁264。而陳明則以董仲舒具有儒家知識分子之理想，其云：「質言之，董氏是基於其信仰，將儒學理解為道，一種社會理想以及實現這一理想的路徑方法，著重的是儒學的價值屬性。漢武則是出於統治天下的需要，提高行政秩序的水平和控制的有效性，將儒學理解為軌則百姓的手段，看中的是儒學的工具（術）屬性。」參氏著《儒學的歷史與文化功能：以中古士族現象為個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78。

〔註6〕賴麗蓉《魏晉『人物品鑑』研究——創造性審美活動的完成》，頁18。

〔註7〕勞思光云：「先秦言『名』者，基本上不外兩大派，一派以道德旨趣及政治旨趣為主，另一派以形上學旨趣及邏輯旨趣為主。孔子之言『正名』，基本上表示道德旨趣，但因此種觀點涉及『職分』觀念，故由此亦引出政治旨趣。另一面道家言『無名』、『有名』，以『名』為符號指謂，而又認為『名』是一種限定；故極論『道』之『無名』，以明『道』之『無限性』。此基本上表示形上學旨趣；但因既以『名』為限定意義之符號，故由此亦引出邏輯旨趣。」見氏著《中國哲學史》第二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80年），頁156。

〔註8〕。士階層自覺、且有意識地利用品鑒形塑清流群體，利用品鑒者之身分、知識、道德、眼光，抬升自我輿論權力，使之成爲政治利器，以監督政治、以挽救傾危的家國，然而其中更夾雜許多聲名利祿的競逐者。

這股品評風潮，在桓靈之際反宦官的政治運動中達到顛峰，其時，知人品鑒幾成知識份子的群體意識，知人精準者更是輿論中心，於是，一些有心人士，開始利用這波品鑒浪潮，或以假亂真，享受威權，如晉文經、黃子艾等輩；〔註9〕或攀附名知人驥尾，哄抬聲價，如曹操向許劭求目等，〔註10〕社會陷入品藻的追逐中，名實關係惑亂難辨。郭泰（字林宗，128~169）、許劭（字子將，150~196）二位知人典範，便在此背景下形成。

知人典範形成，必有群體意識爲共同傾向。郭泰、許劭年紀僅差二十三歲，但兩人並非同時成爲社會的理想人物，典型亦截然不同。但晉宋時人好並論郭、許，而後代研究亦因此以郭、許爲漢晉品鑒風氣起點。〔註11〕所謂起點，即將二人同時看待；或雖知二人年紀略有先後，但不明其間，時代風氣起了什麼變化；或視二人爲同流，不能具體指出郭、許之別，自然更不明白兩人典範差異，及其背後所符應的時代需求。

首先留意到郭、許差異的現代學者，是岡村繁。岡村繁指出，郭泰的品評旨趣在「寬宏濟士」，許劭則是「善善惡惡」，二人的差異「反映出以黨錮之獄爲中心的前後兩個時期的變化。」〔註12〕岡村繁道出郭、許品評旨趣不

〔註8〕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云：「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宦官之勢力日處於激烈鬥爭之中，士之群體自覺意識遂亦隨之而日趨明確。」參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0年），頁206。

〔註9〕 《後漢書·許劭傳》：「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二人自是名論漸衰。」頁2232~2233。

〔註10〕 《後漢書·許劭傳》：「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頁2234。

〔註11〕 如洪然升云，「『人倫識鑒』、『知人之鑒』、『拔才取士』、『許、郭』等詞便連成了一條意義完足的理解脈絡……郭泰、許劭都將會是不可變易的理解始點。」參氏著《六朝「文士／文藝」品鑒論》（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陳昌明先生指導，2008年），頁74。

〔註12〕 岡村繁〈郭泰和許劭的人物評論〉，收入日·岡村繁著，陸曉光譯《漢魏六朝の思想和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86。以下岡村繁之文皆出於此書，不再繫註。

同，又找到黨錮這條重要的分野線，從中劃分知人典範從郭泰走向許劭，品評風氣從寬宏濟士走向善善惡惡的時代變化。然因其文重心在郭、許，故並未再細究黨錮居間，牽動二人及整個時代的品鑒關鍵何在。

為何一場黨錮，知人典型立即從郭泰轉成許劭？而郭、許差異如此之大，晉宋時人又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並論二人？如果仔細追索，會發現對郭、許的評價，因應不同時代而有所變異，且同一時代，亦非僅有一面聲浪。比如漢末，在多數士人崇仰郭泰時，已有范冉等人輕鄙之。而經歷黨錮之禍後，社會更由讚郭轉向揚許。若未細加區辨，概皆以漢末品鑒風氣下的產物籠統並論，自然對二人之別、時代之異，皆不能敏銳覺察，更遑論進一步探究風氣轉向之原因。

事實上，緊接漢末而下的三國時人，對郭、許之異是有清楚認識的，但對二人之毀譽亦不盡相同。以陸瑁、周斐（或作周裴）為例。吳·陸瑁曾與暨豔書云：「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註 13〕陸瑁以郭泰為典範，一方面是為警示盛明臧否的暨豔稍加收斂，以免致禍；同時也站在王業一統的人才需求，以弘濟為上，故而揚郭抑許。另外，魏·周斐曾以汝南中正身分，上表稱美許劭：「許劭高□遺風……時有知人之鑒。自漢中葉以來，其狀人取士，援引扶持，進導招致，則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亂，斷冤滯，摘虛名，誠未有如劭之懿也。」〔註 14〕周斐雖未貶抑郭泰，但其以汝南中正官角色，上表讚揚許劭之意何在？若只是阿私鄉曲，又何須做出此政治動作？且周斐不僅讚揚許劭一人，又著有《汝南先賢傳》，對汝南先賢多所表彰，其意何在？胡寶國曾指出：「在士族政治逐漸抬頭的年代，政治上失勢或文化上相對落後的地區只能以眾多先賢來證明自身的價值，並與產生了著名士族的地區對抗。」〔註 15〕胡寶國分析先賢傳記等書寫，背後實隱含政治角力在其中。姑且不論胡寶國分析是否正確，但其文彰顯了評價的複雜性。為何周斐、陸瑁雖皆能區辨郭、許，卻做出毀譽不一的評論？可見其評論背後，還交織著個

〔註 13〕「時尚書暨豔，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三國志·吳書·陸瑁傳》，頁 1377。

〔註 14〕《世說新語箋疏·賞譽》，注引《續談助》載《殷芸小說·許劭列傳》，頁 415。

〔註 15〕胡寶國〈雜傳與人物品評〉，收入氏著《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45。

人意圖、友朋關係、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等等內外因素，評論者本身如何做出評論，就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而三國雖多能區辨郭、許，但已開始出現並論郭、許者，比如吳之謝承：「許邵……拔樊子昭於未聞，天下咸稱許、郭。」〔註 16〕從拔士角度論二人之同。而至晉宋時人，更將「許、郭」連成一組共同追效的新典型，如兩晉時期，「(桓)彝……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註 17〕武周謂劉公榮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註 18〕山簡云：「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註 19〕南朝時期，宋·范曄載：「天下言拔士者，惟稱許、郭。」〔註 20〕梁·任昉云：「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註 21〕綜合上述六條資料可知，郭、許被並稱的主要特質是「知人」及「拔士」（各三條）；其次則因二人的在野身分（一條）。而郭泰長於許劭，卻有四條資料將許劭置於郭泰前，可見至晉宋，對郭、許品評以黨錮爲分野的時代轉向已混沌不明，甚至有以許劭爲高之況味。至於晉宋時人爲何好論「許、郭」？此又是另一個大哉問，〔註 22〕非本文所處理者。但顯而見的是，對「知人者」的期待視野，早已逸離《尚書》中以「安民」爲本之論述框架。

由上，乃試圖呈顯，從漢末、三國、到晉宋，關於郭、許的評價，呈現著時代的波折；即使同一時代，亦毀譽參半。那麼，誰說的才是真相？若不能釐清評論者基於何種背景、立場發話，其內在意圖是什麼，一層層抽絲剝繭，很容易就淹沒在「時論」中。而時論雖能表示出主流聲音，但不見得是全面的真相，尤其當評論者或有意、或無意地混入個人欲求於其中，更容易做出偏頗的歷史定位。

〔註 16〕《太平御覽》引謝承《後漢書》，頁 2163~2。許邵、許劭有異文，行文皆統一爲「許劭」。

〔註 17〕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晉書·桓彝傳》（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939。

〔註 18〕《三國志·魏書·胡質傳》注引虞預《晉書》，頁 742。

〔註 19〕《晉書·山簡傳》，頁 1229。

〔註 20〕《後漢書·許劭傳》，頁 2234。

〔註 21〕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見《文選》，頁 548。

〔註 22〕洪然升曾從「社會輿論權力象徵」的角度，解釋六朝時人並稱郭許之現象，他云：「許劭、郭泰之並稱『許、郭』的聯繫環節非僅是『善人倫』、『拔士』，其深刻處更建立在兩人作爲『社會輿論權力之象徵』這一點上。」洪然升《六朝「文士／文藝」品鑒論》，頁 77。

而在諸多草率的評論中，岡村繁的態度相對嚴謹許多，因此能做出較令人信服的研究。由此，又可以反推為何六朝時人或現代學者，對郭、許許多所誤讀？其因至少有二：一，對於郭、許的時代背景及發展軌跡，掌握不夠細膩；二，對於郭、許的生命，缺乏深入的探索。

針對其一，目前人物品鑒研究大趨，大致呈顯漢末、魏、兩晉三大斷代之發展，學界的共識是：品鑒標準從重德到重才，品鑒目的從現實政治到生活美學；知人典型從儒生轉為名士。這樣的品鑒風氣勾勒頗為宏觀，但似乎在微觀上，仍有許多歷史空白待補足。比如郭、許二人之間以黨錮為分野，乃待岡村繁指出；又如許劭月旦評進行於何時，持續多久？至今尚無學者深探。然而，不明時風如何，則無法具體指陳知人群體應何背景而生？無法洞察其品鑒言行應何時代需求而動。

針對其二，蓋品鑒行為主體是人，而品鑒風氣之所向，亦繫乎人心，但目前關於人物品鑒風氣之探源，多半是從政治、社會等外緣條件來分析，極少從知人群體本身找原因。而針對風氣之大觀，亦多集中在「品鑒內容」上，探討「如何品鑒」等美學問題；很少針對「品鑒者」本身，探問：他為何品鑒？為何形成這樣的品鑒風格？等生命動機問題。然自東漢桓靈時期以來，隨著政治社會的需求，人物品鑒專家不但大量湧現，且其中佼佼者更居士人群體之首。為了指稱這群社會新貴，史書出現大量辭彙：「議主」、「名知人」、「有知人鑒」、「善人倫」、「臧否得中」、「才照人物」、「篤於物類」、「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人倫自任」……等，豐富的辭彙，顯示士人群體已分化出數量可觀的知人專家，且生命情態頗為多元。這群知人專家不但共時性地相映成趣，且歷時性地綿延二百餘年，故有所謂漢晉人物品鑒蔚為風氣之說。

〔註 23〕既然知人群體被標誌為漢晉社會的獨特階層，而歷史又是由生命所構成，若能從一個個的生命來談品鑒現象，是否能得到具體而深刻的理解？但縱觀目前學界的研究進路，很少從「知人群體」角度來切入的，而對知人群體的生命關注，更是微乎其微。

而暨漢末郭、許以降，三國品鑒研究，焦點是「書」而不是「人」，且幾乎都集中在魏·劉劭《人物志》一書上。眾多研究者中，較能以「人」為研究

〔註 23〕張蓓蓓云：「最足以顯示人物品鑒之蔚然成風者，莫過於漢晉之間號為『知人』及『好人倫』的人士之多。」見氏著《漢晉人物品鑒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 81。